

深化一带一路货币金融合作

■ 经济学博士,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丁志杰



有助于参与国家货币稳定

“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在汇率管理方面普遍存在两个难题:一是汇率波动剧烈风险突出,二是货币大幅贬值导致货币危机。研究发现,一国货币的稳定以及升值对实现该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与参与“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汇率管理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并拥有一些成功经验。如果以经验交流为

切入点,根据不同国家的差异,设计不同的货币金融合作模式,使人民币与相关国家货币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并发挥汇率锚作用,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会使得相关国家的货币币值保持稳定,从而帮助相关国家解决汇率管理难题,促进相关国家经济发展,那么相关国家参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积极性将会得到极大提高,这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能都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本应为跨境人民币结算带来良好发展契机,但实际情况却是“走出去”企业仍以外币结算为主。在一些贸易和并购合作项目中,虽然我国参与方优先考虑使用人民币支付收购款,但是最终却还是采用了美元支付的方式。究其根本,是人民币收付投资渠道有限,与人民币相关的风险管理工具相对较少,因此,

人民币尚未达到便利使用阶段,境外金融机构持有人民币整体意愿偏低。要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须深化我国与相关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在人民币与当地货币之间建立稳定机制,形成人民币在此区域的国际货币竞争优势,这样才能使对方国家愿意持有人民币,人民币才能真正“走出去”“留得住”,并在该地区形成使用闭环。同时,多数“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实行的都是中间汇率安排,与我国的汇率制度具有一定相似性。这为以人民币作为货币锚来建立区域货币稳定体系提供了现实基础。

完善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

“一带一路”货币金融合作已经具备一定基础条件,但我国仍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特别是要建立一个多层次、一体化的外汇衍生品市场。而境内和境外、场内与场外市场都是多层次、多维度外汇衍生品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境内虽已有以银行间市场和

银行柜台市场为代表的场内外外汇衍生品市场,但外汇衍生品的场内市场却还迟迟没有在境内得到发展;而境外多家交易所已积极布局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且交易量增长迅速。抓住“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机遇,我国应顺势而为,逐步补齐场内场内外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不协调的短板。1994年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建立之初的交易所模式对人民币汇率稳定和金融改革深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值得借鉴。同时,探索推进外汇期货上市,也可以丰富外汇市场风险对冲工具,满足我国及相关国家汇率风险管理需要。

“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的货币金融合作应以稳定相关国家汇率和交流经验为切入点,发挥人民币汇率锚作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建立和完善包括外汇期货市场在内的外汇市场体系,是深化货币金融合作的有力保障,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8·学术论坛暨博智宏观论坛年会在京召开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8 学术论坛暨博智宏观论坛年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主持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会议发布了博智宏观论坛中长期发展课题组撰写的“2035: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路径”报告。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等 40 余位经济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 30 余位企业界代表一起出席会议。

“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 40 年的快速增长,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确定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其中,第二个百年目标提出,要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中国从现在开始到 2035 年的发展路径是什么?”刘世锦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第二个重点是结构组成是否合理。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博智宏观论坛中长期发展课题组撰写了“2035: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路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指出,我国经济虽经历 40 年快速增长,但增长质量和效益与前沿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为了更准确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报

告基于刘世锦提出的“终端产品(GFP)”分析框架,梳理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随发展水平提高所呈现出的变化规律。

刘世锦说,终端产品的结构和收入水平紧密关联,但与各国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地位关系不大,因而先发国家终端产品结构演进规律具有普遍意义,能够为我国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2016 年,我国人均 GDP 已达 14000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衡量),报告预测,到 2025 年和 2035 年,该指标将分别达到 25000 美元、35000 美元。同时,报告选取了“先发国家、后发成功追赶型国家、欧洲模式发达国家和资源禀赋丰裕型国家”四类典型发达经济体进行比较,发现在 14000 美元水平时,各经济体除衣食消费外的大多数需求项的相对结构存在差异,但人均 GDP 达到 35000 美元时,各国终端产品结构已明显趋同。

此外,报告还以发达经济体各阶段的样本为基础构建了分阶段的终端产品标准结构。与标准结构相比,我国目前的基建与房地产投资比重过高,而居民的居住、流通、文化体育娱乐等享受型消费比重偏低。同时,我国政府对卫生、社保和福利的消费比重也明显偏低。

报告建议,到 2035 年之前,我国必须在人民消费总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顺应终端产品结构变迁的规律,降低基建、房地产投

资,降低食品、衣着类生存型消费支出的占比,提高人民享受型消费的占比。此外,我国政府消费应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医疗等发展型消费需求。为实现上述目标,报告从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服务业发展、促进基本需求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等六个角度,提出释放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所应采取的举措。

随后,许宪春针对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报告研究的一系列重要结论非常有意,其中揭示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性的东西,对我国下一步的结构变化具有借鉴意义。

许宪春表示,从 GFP 的角度能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将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与其他国家比较,显示出了中国 GFP 结构存在的问题——和标准结构差比较大。

例如,房地产投资占比明显偏高,基础设施投资占比过高、政府对卫生社保福利相对偏低,等等。这也指明了中国 GFP 结构的发展方向,包括房地产投资占比应该有所下降,居民的居住消费占比有所上升,政府应该提高公共消费服务的比重等。

同时,许宪春还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以及从现在到 2035 年中国经济增速回升的潜力作了简要分析。他认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且回落的时间比较长。究其原因,

有五个方面。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速回落,中国的服务出口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周期性回落,国际金融危机起到了助推作用,将中国经济增长回落的幅度加强、回落期拉长了。三是要素供给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消失,自然资源要素供给发生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约束。四是供给需求不平衡的矛盾凸显。传统行业中,低品质产品产能过剩;高技术行业中,高品质产品供给能力不足,严格依赖进口。五是经济规模变大。

同时,对于从现在开始到 2035 年的经济潜力,许宪春表示,尽管恢复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中国经济有很大的潜力。第一是人才潜力。第二是创新潜力。第三是服务业发展潜力。第四是消费潜力。第五是区域发展潜力。“重视这些潜力,中国保持适当的增速还是非常有可能的。”许宪春说。

对此,王小鲁表示赞同。他说,“2035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不难实现的,因为我们仍然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包括城市化未来发展的潜力、生产力提高的潜力、科技进步的潜力等。我们还有大国优势,比如说产业配套能力、巨大的国内市场等。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很难相比的。”他强调,要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不是靠货币刺激,不是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拉动,实践证明,这些已经对经济增长缺乏

有效性。要实现结构改善目标,只能靠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

“这其中,还需要面对两个重要的挑战。一是要在此期间避免金融风险。二是要尽早实现结构再平衡。”王小鲁建议,下一步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一方面要重视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大幅度减少过高的政府行政支出和非必要的低效率的政府投资支出。另一方面,要大幅度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同时,改革资本市场的管理制度,实现各类企业的公平竞争。

曹远征也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经济正在转型,我们需要抓住转型中的最大挑战。“从各国的经验来看,转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全员生产率下降。”他说,“服务业的劳动生产一定会出现劳动生产率下降,引起经济质量和各个方面的变化,这个阶段提高全员生产率,一般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创新就变得非常重要。”曹远征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强国的关键一招,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我们希望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招。”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分别围绕城镇化问题、如何走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等问题进行了主旨发言。

(胡畔)

5 位中外知名经济学家建议: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变?

一夜之间,中美贸易战打响。
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600 亿美元的关税。几小时后,中国商务部便发布声明进行反击——对美国进口水果、猪肉、葡萄酒等商品征收 30 亿美元关税。

中国与美国,全球体量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间的贸易摩擦再次升级。美国对华政策改变、对华征收高关税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5 位中外经济学家给出了各自的建议。

林毅夫：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不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分析认为:一、劳动密集型产品回流美国生产的可能性非常低。二、使美国消费者成本增加。美国对生活必需品的量的需求不会因为进口价格的变化而有太大的变化。对华进口征收 45% 的高关税,这将导致:继续从中国进口,消费者增加 45% 的成本;或者从其他国家越南、印度、非洲进口。但这些地方的产品价格比中国贵,因此如果转移到其他地方进口,对中国的逆差会减少,但是同其他地方的逆差会增高,消费者付出价格也会增高。三、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是为了选举利益,不符合贸易的互惠双赢原则。真正对华采取高关税,将使选民利益也受损,因此比较可能的是对中国的几样产品象征性地征收高关税。

面对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中国的应对策略包括:一、不要过度反应,应该有理有据,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反制措施,但不要全面反击。二、顺势推动国内的全面深化改革。三、如果美国过于强硬,我们也可以对美国一些产品征收高关税。因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几万吨,每一项数量都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四项,如大豆、玉米、计算机芯片,多一点关税,美国生产者绝

对比中国生产者感受更明显。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希望中国慎重对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美国的总体贸易赤字主要是由宏观经济政策决定的,受到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的影响。特朗普的减税法案会增加财政赤字、减少国内储蓄,所以美国贸易将会在多个层次、对多个国家扩大贸易赤字。

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高关税,是否能够减少双边贸易赤字难以确定,要看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举动。如果中国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减少波音订单、减少进口大豆,那么美国虽然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但同时也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

美国征收高关税的举动为减少贸易赤字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不能确保贸易赤字一定会改善。

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拥有技术,有清华这样的大学,可以独立创新,不用依赖外国技术进口和转让。中国现在做出少量让步,代价也要比 10—15 年前的代价高。获取知识和技术的方式很多,让步是很危险的。中国应该坚定地不妥协,同时继续扩大内需和内部增长。

我认为中国能做最好的事情就是,像过去一贯的做法那样,非常慎重地应对,在法制框架内行动。不要愤怒地大吼大叫,不能让特朗普钻空子,也不要让他的行为升级。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应对是非常负责任的。特朗普就像一个运动场上的暴徒,我们不能让他得逞,也不能把自己拉低到和他一样的层次。

姚洋：以“我”为主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和战略的转变

对于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第一,增加进口和国内消费。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上提出现在的矛盾主要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问题,出口的快速增长将造成越来越多的贸易不平衡发展,显然继续大力度鼓励出口不是我们应有的方向。在达沃斯会议上,刘鹤提出今年中国会实行更多的开放政策,将持续增加进口力度。中国每年进口大约两万多亿美元,其中消费品进口仅占 3%—4%,不足其他国家的一半。因此,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继续开放消费品进口市场的时候。此外,在经贸关系方面要以国内需求为主,中国经济在转型,需要增强国内消费。

第二,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持续扩大外资开放领域,激励民营企业做得更好。负面清单制度说了不止 10 年,至今还未能出台,现在的行业管理都是有罪推定,导致行政成本极其高昂,也使得部分产品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国外市场价格。政府应该及时出台负面清单,扩大对外和对内开放,增加行业竞争水平,通过“快鱼”激活“慢鱼”,激励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比如,从家电、汽车等行业对外放开竞争的历程来看,放开竞争后,民营企业没有倒下,反而促使我们的民营企业做得更好。

第三,实行国企改革。美国对中国抱怨很多的一点就是国企的补贴太高了。如果现在去清算国有企业海外的资产,恐怕 80% 危机之后购买的资产都亏了,而且不是亏一点点。这些钱都是拿国家补贴得来的,从我们国内来说,这种海量的补贴也不是应该的。

因此,我们应以中美贸易摩擦的外溢效果来推进国内的改革,如果能做到以中国“我”为主的立场,重新考虑中美经贸关系,也许会把中美关系理得更顺。

向松祚：中美贸易关系的复杂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也是中美关系里较为复杂的一个侧面,主要表现在货币金融、政治因素等层面。

从货币金融层面来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完全取决于中美关系,从国际货币的运作体系看,只要美国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就

必然是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国家。从货币金融层面来看,美国贸易逆差本质是贸易体系的内在结构造成的。

从政治因素方面看,一方面,美国担心全球领导者、规则制定者和国际霸权地位的丢失,担心中国会取代他。另一方面,东西方文明有很大差异。西方宗教是排他的,不信基督教就是异教徒。但在中国,儒释道是一种融合的文化。这种文明的差异会使得中美的纷争可能持续下去,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基于以上判断,中国如何应对? 第一,讲究策略。主流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以及重要大学、研究机构有威望的学者在发表言论的时候需要讲究策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对中国非常不利的话措词要慎重,以避免让美国解读出一些错误信号。第二,在具体措施上应该因势利导。格林斯潘回忆录说,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美国通胀越来越低,但遏制通胀不都是美国的功劳,中国源源不断地把廉价产品输入美国,才是对美国维持通胀的最大帮助。这些观点道理应该向美国讲清楚,不能任由其完全政治化、情绪化的言论和认知主导。

徐高：中美贸易战的因素分析

光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指出,中美和则双赢、战则双输,不打贸易战对中美双方均是有利的,但中美贸易战仍有触发的可能。从短期看,美国主要目标是要降低对外贸易赤字。特朗普上台前就誓言降低美国对外贸易赤字,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从 2016 年 3470 亿上升到 2017 年 3721 亿美元,反而对中国贸易赤字增加了。现在正面临着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一定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并释放信号来为选战服务。从长期看,现在美国精英认识到中国不可能走美国的发展道路,且未来中国经济规模预测会超过美国。从世界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从第二超过第一的国家,往往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便两个国家不打仗也会有很多的矛盾冲突。因此,中美贸易的摩擦和冲突必然会增加。

中美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无法化解。首先,核心矛盾是第一与第二的历史性矛盾,美国不会轻易把第一的位置拱手相让。其次,是中美发展道路的差异,两个国家有各自的发展模式。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发展模式不可能全盘西化,美国想要中国走向美国模式,这是中国不可能给的。这种情况下,美中矛盾就存在着激化的可能。因此,在这种格局下,如何处理中美关系? 从博弈的角度看,不可能根本性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

如何防止矛盾的激化? 第一,建立威慑。中国是贸易顺差国,美国是贸易逆差国,如果贸易战爆发,中国无非把本来输出给美国的东西留给自己用;但如果美国不再从中国进口大量生活必需品,则会引发美国国内居民福利大幅下降,必定会侵蚀特朗普的民众支持度。

第二,充分运用多边框架架构的统一战线。中国是全球自由贸易受益者,如果中美贸易战爆发,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会间接伤害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里,有很多增加值高的中间品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组装后再卖到美国所获得的,如 iPhone。从这个道理讲,中国有很多利益同盟国家可以结成统一战线来应对美国。

第三,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可以将服务贸易这一大市场开放给美国的竞争对手——欧洲,或者让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稍微慢一点,美国作为服务提供大国,绝对不愿意失去中国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先机的。这种做法将比向美国征收进口商品关税的效果更好。

第四,从中国内部着手,扩大内需。如果贸易战爆发,中国的外需将下降,维持国家的经济稳定就要扩大内需。从短期看,内需可以来自投资,一定时间内依靠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稳定是有必要的。从长远来看,在产能过剩的世界经济里面,产能不是约束,需求才是约束。中国除了做世界工厂以外,还需要转变为全世界的大买家,要为全世界创造需求。

(李思)